

胆敢木剑战恐龙的美国民权女前贤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40)

第十三次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发生在公海上的正义革命事件。历史再三的向人类反复说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

奴隶贩子从非洲大陆上用暴力手段将非洲黑人强行押到运奴船上，运到欧美谋取暴利，可是并不是每次都那么顺手，在物极必反的真理下，不但没有得到他们期待中的暴利，反而连自己的性命都要赔上，1839年运奴船“阿米斯特德号(La Amistad)喋血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美洲近代非洲黑人奴隶抗暴事件中，没有一件比“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更具影响力，更具时代意义，更具争议性的了，也没有任何一次的奴隶抗暴事件是如此的血腥，如此的激昂，从而导致美国与西班牙帝国陷入了长期的外交困局。

“阿米斯特德号”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将美国境内奴隶制度的问题激化成了一个使人无法再回避的议题，不但促成了拥护与反对两大阵营的彻底摊牌，也为未来美国南北分裂埋下了爆发的种子。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发展史上，没有一件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如此的精彩，其影响之大，出乎所有当事人的意料之外，介入此案的美国政府官员层次之高，亦是空前绝后，仅美国总统，就有三位之多。

“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发生时，白宫的主人是第美国8任总统马丁·温比伦(President Martin Van Buren)，他本来是想运用快刀斩乱麻的政治手段来处理“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甚至于不惜诉诸强行绑架的手段去解决之，但是事与愿违，他还没来得及把事情处理完，就被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赶了台。

可是哈里森并没有当美国总统的命，在他1841年3月4日宣誓就职的那天，冷雨交加，而他的就职演讲却又长又闷，不仅使他的听众吃尽了苦头，连他自己也因此受病，一边打喷嚏，一边做演讲，回到白宫，勉强带着病体去对付那些虚假的应酬，蜜月期刚过，还没开始工作，就于1841年4月4日，一命呜呼了。

哈里森的副总统约翰·小泰勒(Vice President John Tyler, Jr.)宣誓上任才一个月，就接任成为美国第10任总统，天也，命也，岂可不信乎？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迷信，但小泰勒总统是一位既迷信又信邪之人，虽然只干了一任就被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踢出了白宫，但他在任期内就是不肯再设副总统一职，以免“不吉利”。

在“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中，世人不但看到了一位美国白人律师罗杰·谢尔曼·包德温(Roger Sherman Baldwin)为了正义而坚持不舍，奋不顾身，世人也看到美国政客们为了政治利益而巧言狡辩，胡作非为。世人看到一位年轻的美国大法官史密斯·汤普森(US Justice Smith Thompson)不畏政治压力，断然裁决被美国政府以谋杀重罪起诉的非洲黑人抗暴奴隶是自由人。

世人看到一位贪婪的美国海军军官托马斯·格德尼上尉(Lieutenant Thomas Gedney)见财起意，梦想从中捞上一把；世人看到一位美国反对奴隶制度的先锋阿瑟·塔潘(Arthur Tappan)的义薄云天，舍弃自己优越的富豪生活而介入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洪流中；世人看到已经退休的美国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President John Quincy Adams)为了人间正义，义务地在美国最高法院上老将挥戈，为自己画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句号。

为整件“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扭转乾坤的人物是亚当斯，他在美国最高法院上的辩论文词，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他于1841年3月2日在美国最高法院里为“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所做的长达75页纸的辩护陈词，在170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使人动容，依然使人激动，依然使人对他肃然起敬。

亚当斯合情合理的正义之词，固然是使“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的案件胜利的主要法理基础，但是他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地位，却是促使八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倾向于他的重要因素。

亚当斯并不是一位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他与美国反奴隶制度组织的关系，一直保持着对立的状态，他们之间，还有着数次互相叫阵与辱骂的记录，他在临老之年，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挺身而出，义务为“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辩护，虽然使人有点惊讶，却也使人对之更加尊重。

从有关“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中有关人物的背景和思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件事发展的脉络，这得从“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在美国最高法院中的辩护律师亚当斯说起。

撇开显赫的家世和完整的资历不说，亚当斯是一位典型的有良知的美国知识分子，他在美国最高法院为“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上的非洲黑人奴隶们争取得了自由后，潇洒地挥袖而去，没有向任何人寄过服务费帐单，也没有向任何人收过一毛钱律师费，其高风亮节，世上少见。

亚当斯的父亲是美国的独立革命英雄、开国元勋、《美国宪法》起稿人、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President John Adams)，他的母亲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Abigail Smith Adams)是一位优秀的美国女性。

亚当斯于1767年7月11日在英国殖民地马萨诸塞湾布伦特里市(Braintre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 British America)出生。他从12岁开始，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到他1848年去世前，从未间断，这些第一手资料，成为日后世人研究那段历史和亚当斯思想的重要来源。

亚当斯曾经跟随他父亲出使法国、荷兰等西欧诸国，加之自己在14岁之年，就以随行秘书的名义，陪着美国特使弗朗西斯·戴纳(Francis Dana)出使俄罗斯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为争取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承认权而努力，他因为这些经历而拥有通晓数国语言的优势，是与他同年的一般美国青年人无法相比的。

1778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亚当斯开始在马萨诸塞从事律师业务。1796年，乔治·华盛顿总统委派年仅26岁的亚当斯出任美国驻荷兰全权大使，两年后又转任美国驻葡萄牙的全权大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亚当斯的父亲约翰·亚当斯出任美国总统后，内举不避亲，于1797年又委派他出任驻普鲁士(Prussia)的全权大使，他在大使的任期内，完成了促进美国与普鲁士的《普鲁士-美国条约(Prussia-American Treaty)》。

在普鲁士做大使的两年任期间，亚当斯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路易莎·凯瑟琳·约翰逊(Louisa Catherine Johnson)。约翰逊在普鲁士出生，她的双亲都是在普鲁士经商的美国人，这段姻缘，使约翰逊成为美国历史上至今为止唯一在国外出生的美国第一夫人。

亚当斯于1801年返回美国后，出任“美邦破产委员会”主席，可是被他父亲的政敌托马斯·杰斐逊于(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于次年将他撤职。1802年4月，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

1803年，亚当斯以美国“联邦党”黑马的姿势，当选为代表马萨诸塞州美国参议员。在华盛顿的国会里，亚当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重，丝毫不理会“联邦党”的反对，支持杰斐逊总统向法国《收购路易斯安那法案》和《杰斐逊禁运法案(Jefferson's Embargo Act)》，这个政治立场导致他全面地与“联邦党”反目成仇，他于1808年6月8日突然宣布退出“联邦党”，并于同日加入“民主共和党(Democrat-Republican)”。

1819年，美国新总统詹姆斯·麦迪逊(President James Madison, Jr.)委任亚当斯为美国派驻俄罗斯全权大使。1814年，他奉命回国，参与结束美国和英国之间因为独立战争而引起的敌意和矛盾的《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的谈判。

《根特条约》因为两国在比利时根特市(Ghent)谈判而命名。两国代表于1814年12月24日圣诞节除夕日签字，达成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于1815年2月16日全体一致无异议批准通过，美国总统麦迪逊于次日将之签成法案，自此为英美两国的外交开启了新的篇章。

英美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后，美国总统麦迪逊委任亚当斯为美国第一任派驻英国全权大使，这正是他父亲当年的同一职位。

詹姆斯·门罗于1817年3月4日宣誓就任美国第5任总统，亚当斯出任了他的两任美国国务卿，长达8年之久。1824年，亚当斯当选为美国第6任总统，虽然只干了一任，便被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赶出了白宫，但已经为美国近代政治，留下了一篇传奇的事迹。

亚当斯在1825年3月4日宣誓就职美国第6任总统时，在宣誓就职的典礼上，他为了鼓吹政教分离，他的左手按着的不是传统的《圣经》而是《美国宪法》。

亚当斯是一位有个性的政治家，他在全美的总统大选中输给了安德鲁·杰克逊，但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怨言。可是杰克逊在当选美国总统后，并没有依照美国总统的传统，向临别的前任做出礼貌性的照会，态度傲慢，特意怠慢于他，于是亚当斯亦像他父亲不参加杰斐逊总统的就职典礼一样，拒绝前往参加杰克逊的就职典礼，挥袖而去。

在美国总统历史上的44位总统中，共有3位去职总统不参加其继位者的就职典礼的前例，除了亚当斯父子外，另外一位就是安德鲁·约翰逊。他在林肯总统遇刺死亡后，于1865年4月15日成为新的继任美国总统，由于他的内阁贪污丑闻不断，导致被美国国会弹劾，虽然以一票之差过关，却也成了跛脚总统，终在1869年3月4日，黯然下台，成为美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任总统。

在美国独立后的头48年间，亚当斯父子是唯一的父子档美国总统，也是只干了一任就被赶下台的两位父子档总统，一直到了175年后，美国才出了另外一对布什父子档总统。

亚当斯被杰克逊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策划夺权后，并没有退休，1830年，他以“国家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候选人的资格，当选为美国众议员，他从1831年3月4日开始，一直到1848年2月23日，以80岁的高龄，死在任上为止，总共干了17年之久。

在美国的政治史上，共有两位去职总统又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一位是亚当斯，另外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他被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赶出白宫后，不甘寂寞，又在1875年3月4日，当选为代表田纳西州的美国参议员，上任后还来不及有所作为，就在同年的7月31日死在任上，享年66岁。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辞职总统后又当选为美国参议员的人。

“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发生时，亚当斯正在出任代表马萨诸塞州第8、第11和第12选区的美国众议员。他并不是一位废除奴隶制度的支持者，他一直与废除奴隶制度的民权组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他对美国民权、自由与民主的热情追求，也使他对美国民权运动充满了同情和尊重。美国虽然是不允许任何新的奴隶进入美国，但是奴隶制度在美国国内依然是被公开认可的，依然是合法存在的。

另外一点就是亚当斯已经清楚地看出西班牙王国已经外强中干，日落西山，根本无力以武力来做外交后盾，西班牙政府的所谓外交介入，只是摆摆高姿态而已。这就是他愿意义务为“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辩护的客观环境与心理因素“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是亚当斯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案件，也因此案使后代美国人对她更为仰慕和敬崇。

“阿米斯特德”是一句西班牙语，是“友谊(friendship)”的意思。120尺长的“阿米斯特德号”原名叫作“友谊号”，后来改名为“阿米斯特德号”。“阿米斯特德号”是于十九世纪初期时，在美国制造的一艘运货船，船籍登记为洪都拉斯，原来的船主是来自罗德岛纽波特市的乔治·赫福特(Captain George Hanford, Newport)。

“阿米斯特德号”后来转卖予一位居住在古巴的西班牙人，作为短程的内陆运糖船。由于利益的诱惑，船主偶然也会用它来运输几次非洲黑人奴隶，作为额外的收入。

当时最为著名的远洋运奴船叫作“特科拉号(Tecora)”，一次可以运输多达400余名非洲黑人奴隶，为了节省地方和安全，被绑架的黑人奴隶多被扒光衣服，用铁链子将手脚串起来，平躺在船舱里。

由于“阿米斯特德号”当初并不是被设计为运奴船，船舱只能容纳下一半的非洲黑人奴隶，另外一半的黑人奴隶，只好置放在甲板露天处。这给一位叫作森贝·皮(Sing-be Pieh)的奴隶领袖一个起义的机会。

“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在美国闹开后，新闻界慢慢地以“约瑟夫·钦奎(Joseph Cinque)”来称呼森贝·皮，时间久了，“森贝·皮”也就变成了“约瑟夫·钦奎”了。他是一位来自西非塞拉利昂摩尼族(Mani Country, Sierra Leone)勇敢的小酋长，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男二女三个孩子的幸福家庭，他母亲早逝，与父亲同居。

1839年4月，钦奎在村外，被4位自己同村的人用一张黑网和几根绳子，捆绑起来，押到西非塞拉利昂龙博口(Lomboko)奴隶市场，卖给了葡萄牙奴隶贩子。葡萄牙奴隶贩子用小船将钦奎押到停泊在外海的大型运奴船“特科拉号”上，押到古巴哈瓦那(Havana)，谋取高利。

那段时期，葡萄牙奴隶贩子的生意鼎盛，仅是从1837年至1839年的两年间，他们就从非洲绑架了25,000名非洲黑人，作为他们发财的“货物”。到了古巴后，葡萄牙奴隶贩子将非洲黑人奴隶在古巴哈瓦那卖给了西班牙人皮德罗·蒙特斯(Pedro Montes)和约瑟·鲁伊斯(Jose Ruiz)，做为农场的奴隶。

1839年6月27日，这两位奴隶贩子将这批新买回来的包括钦奎在内的53名，其中49名大人，4名小孩子的非洲黑人奴隶，用租下的“阿米斯特德号”，运返古巴普埃尔托·普林西佩(Puerto Principe)。

这次的“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就是发生在从古巴哈瓦那到普林西佩的半途中。整个航程本来不是很远，预计只需要三天的时间，就可到达目的地，但在启程的次日，遇到了暴风雨，导致耽搁了时间，问题是船上的饮水和食物，已经几乎全部吃光了。

那位黑白混血儿的伙夫塞莱斯蒂诺(Celestino)口出恶言，说要宰杀几个黑鬼来充饥，这个消息使所有的非洲黑人奴隶紧张得快要疯狂起来，求生的欲望使他们决定奋起抗暴，要用暴力来换取生存的空间。

1839年7月1日夜里，钦奎在“阿米斯特德号”的船舱底下，与他的副手基拉巴如(Gi-la-ba-ru)用预先藏起来的铁钉子打开了铁链子的枷锁，将其余的非洲黑人奴隶也全部释放了出来。他们在船舱底下的大货箱里，找到了两箱割甘蔗用的砍刀，于是呼啸而上，奋力冲到甲板上。

基拉巴如长得个头很小，只有4尺11寸高，是钦奎的同乡，双亲已逝，有妻子，但没有孩子，他是在“阿米斯特德号”上唯一在非洲老家就认识钦奎的人，他会说非洲的维(Vai)、坎努(Kon-no)和基希(Gissi)三种非洲方言，这在后来的美国司法大战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桥梁作用。

抗暴奴隶们第一个屠杀的就是那位极其凶残的伙食夫塞莱斯蒂诺，然后就是那位奴隶主管雷蒙·费雷尔(Captain Ramon Ferrer)。有两位机警的水手，看到了其它白人的可怕死相，吓得毛手毛脚的解下了救生小艇，死命地划出了地狱门。

在混乱中，有4位非洲黑人奴隶被白人船员射杀，钦奎将除了在掌舵的鲁伊斯和蒙特斯外，一律砍杀，弃尸大海。

钦奎拿着砍刀，连比带划地用手语命令奴隶主管费雷尔和他的奴隶安东尼奥(Antonio)为翻译，将“阿米斯特德号”开回西非塞拉利昂。这个死里逃生的奴隶主故意假装服从，欺骗钦奎，白天朝东扬帆，晚上则向着西北拐弯，超着美国东海岸的方向前进，希望能够遇到美国海军，博取一线生机。

这两个狡猾的奴隶主的阴谋诡计果然得逞。1839年8月26日，“阿米斯特德号”漂流在美东纽约州长岛市(Long Island, New York)外海时，被美国海军测量舰“华盛顿号(USS Washington)”发现了，遂将之拉回了美国的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New London)。

“阿米斯特德号”上抗暴的非洲黑人奴隶们待在船上，静候美国巡回法庭安德鲁·汤普森·贾德森法官(US Judge Andrew Thompson Judson)的发落。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近代发展史上，贾德森法官是一位声名狼藉的反面人物的代表。

贾德森于1784年11月29日在康涅狄格州温德姆县伊斯特福德市(Eastford, Windham County)出生，他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全凭自己努力进修，1806年取得了康涅狄格州的律师资格。

1809年开始，贾德森成为康涅狄格州温德姆县的执业律师；1822年当选为康涅狄格州众议员；1835年当选为美国众议员，他在这个位子上只干了一年多，就辞去了辛苦竞选回来的民意代表位子，接受美国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提名，出任康涅狄格州区美国法官。他在这个位子上从1836年6月28日开始，一直干到他在1853年3月17日死在任上为止，长达17年之久。

当“阿米斯特德号喋血事件”在1839年爆发时，案件的预审庭，正好落在贾德森法官的手里，这个巧合，使美国民权分子和反奴隶制度分子格外的紧张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非洲黑人奴隶的前途，如今落在这位一向以歧视黑人而闻名的法官手里，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

有一个有关贾德森种族歧视的典故，从这个故事里，世人可以看出贾德森的庐山真面目。贾德森的家住在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Canterbury)，和普露登丝·克兰多尔(Prudence Crandall)是邻居。

克兰多尔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也是在美国推行不分种族，有教无类教育理念的先锋。她于1803年9月3日在罗得岛霍普金顿镇(Hopkinton)出生，她的父亲巴顿·克兰多尔(Pardon Crandall)和母亲伊丝特·卡彭特(Easter Carpenter)，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坚定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大将。

克兰多尔就读于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市友谊寄宿学校(Friend's Boarding School, Providence)，17岁时，随双亲搬迁至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毕业后开始任教于康涅狄格州普莱恩菲尔德市(Plainfield)的女子学校。

1831年，克兰多尔与她姐姐阿尔米拉·克兰多尔(Almira Crandall)在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开创了“坎特伯雷女子寄宿学校(Canterbury Female Boarding School)”，这个教育计划，得到了她的邻居——那位当时是全康涅狄格州最有权势的人——贾德森的大力支持，并且出任她学校的董事局成员，克兰多尔与贾德森两家，可谓是往来密切，通家之好。

可是这种美好关系在1832年秋天发生的一件学生事件后开始变味，最终演变成反目成仇。那位导致克兰多尔与贾德森两家抓破脸的学生叫做萨拉·哈里斯(Sarah Harries)，她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她的双亲是自由黑人，在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近郊拥有一座小型农场，她自小就读在当地的学校，唯一与白人同学的分别就是她来自上帝的肤色。

哈里斯为了达成自己将来成为教育黑人学生的老师的梦想，要求克兰多尔允许她在坎特伯雷女子寄宿学校继续进修，克兰多尔立即向这位优秀的黑人女青年伸出了欢迎的双臂。

然而这个决定，触怒了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保守的白人，更触怒了她的邻居贾德森。这些保守白人联合起来，要求克兰多尔将哈里斯驱赶出她的学校，但立即遭到她坚决的反对。贾德森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恼羞成怒，于是联合了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保守的白人，召开市民大会，商量着如何整肃克兰多尔。

这些反动分子的手段是：第一，口头抗议，希望克兰多尔能够“知错而改正”；第二，将自家的女儿撤出坎特伯雷女子寄宿学校，在经济上抵制克兰多尔，要她无法生存下去；第三，以各种理由将她送上法庭，使她无闲也无法正常工作，当然，最终之目的是要将她关进监狱。

克兰多尔并没有向这些黑暗势力低头，她看见所有的白人学生都离开了，于是灵机一动，干脆将“坎特伯雷女子寄宿学校”改为“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Young Ladies and Misses of Color)”，成为了美国第一所专为非洲裔美国人开创的女子寄宿学校。

在克兰多尔的报纸大幅的广告号召下，短时间之内，起了惊人的效果：来自美东各大城市的非洲裔美国人，纷纷将他们的女儿，送进了“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就读。

这个演变使包括贾德森在内的反动分子接近情绪爆炸的边缘，在贾德森背后的操作和安排下，康涅狄格州于1833年5月24日通过了使美国精神蒙羞的《黑色法案(The Black Law)》，严格禁止外州的黑人学生，在没有得到当地市民大会的同意之前，进入康涅狄格州境内的任何学校。

在《黑色法案》的淫威之下，“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的师生们买不到食物，坐不上公车，甚至看不到医生。

在这条《黑色法案》的淫威之下，克兰多尔在1833年7月8日被拘捕归案，警察把她关进监狱一天后，于次日交保候审。纽约市的反奴隶制度组织领袖塔潘得知后，出钱出力，全力介入这件天人同怒的不公不义的案件。

在贾德森的暗示下，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当地的土豪们为了要将尚且不肯低头的克兰多尔彻底打垮，居然派出了一位当地的流氓，在“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师生们唯一喝水的井里放毒，然后严格禁止任何人向“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的师生们提供水源。

在“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里，克兰多尔并不是唯一的暴政受害着，17岁的非洲裔美国人学生安娜·伊莱扎·哈蒙德(Anna Eliza Hammond)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下被警察以“恶意破坏法律”的莫需有的罪名拘捕，而康涅狄格州法官为她定的保释金，居然高达一万元，那相当于叛国罪嫌疑犯的标准。

一位基督教牧师实在看不过了，站在讲坛上为克兰多尔祷告和打气，但却激怒了贾德森，他居然公开地扬言说：“我们不仅是反对在坎特伯雷市开设这种学校，而且反对在任何康涅狄格州境内开设这种学校，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色人种是永远不允许从他们卑贱的条件那里翻身的。”从这些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言谈观点里，贾德森的丑陋嘴脸，毫无掩饰地暴露在阳光底下。

康涅狄格州司法部起诉克兰多尔犯了法——犯了《黑色法案》——的司法大战，于1833年8月23日在康涅狄格州温德姆县法庭(Windham County)上演，整件案子的辩论重点，是由一位白人去教育黑人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精神。

克兰多尔的律师告诉康涅狄格州温德姆县法庭的法官说，非洲裔美国人是《美国宪法》定义下的美国公民，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应有的宪法权利。康涅狄格州司法部的律师则强辩称，自由黑人并不是美国公民，而《美国宪法》条文中，也没有说明自由黑人有权成为美国公民，既然他们不是美国公民，当然无权尤其是在康涅狄格州接受白人的教育。

康涅狄格州温德姆县法庭的陪审团被这些似是而非的法律理论弄糊涂了，案件竟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宣布流审。案件被转移到高等法院去做决定，在康涅狄格州高等法院那里，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土豪们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裁决“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的白人教育黑人的政策为非法。

克兰多尔当然不服，将案件于1834年7月上诉至康涅狄格州最高非常上诉法院(Connecticut Supreme Court of Errors)，事情有了转机：康涅狄格州最高非常上诉法院避开了“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的白人教育黑人政策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的议题，而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将全案撤销。

康涅狄格州最高非常上诉法院这么裁决是基于这样一个顾虑：如果采取支持康涅狄格州温德姆县法庭的“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的白人教育黑人政策为非法裁决的话，那么，这件有关《美国宪法》原则的案件，肯定是会闹到美国最高法院那里去的。当这件不太光彩的案件离开了康涅狄格州后，那么，事情的发展就很难说了，所以康涅狄格州最高非常上诉法院就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将案件结束掉。

克兰多尔的“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没有被暴政的恶法击倒，可是却被当地的白人反动分子的流氓行为摆平。就在康涅狄格州最高非常上诉法院的裁决下来后的第二天，“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所有的玻璃窗，全被石块砸碎，大门也被斧头劈开了一个大洞。

克兰多尔虽然依然不被这些恶意的攻击吓倒，虽然发誓要将“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继续办下去，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她英雄无用武之地——1834年9月9日，“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被当地的流氓们用一把野火，烧成了废墟一片。

克兰多尔没有重建“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的经济能力，就算重建成功，还是摆脱不了再度被烧毁的命运，一个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弱质单身女子，用一把木剑去挑战一群恐龙，是不太可能出现奇迹的。

克兰多尔伤心之余，为了学生们的安全，不得不在1834年9月10日作出痛苦的决定，宣布将“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关闭。克兰多尔带着沉重的心情，与新婚的基督教牧师卡尔文·斐里欧(Reverend Calvin Phileo)离开了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市，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定居，终生在忧郁遗憾中度过。

克兰多尔的学校没有了，但她的传奇故事并没有被世人忘记。在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等知识分子的仗义奔走下，《黑色法案》在1838年被废除，而康涅狄格州议会为了补偿新寡妇克兰多尔的经济和精神损失，通过了一条特别议案，每月发放四百元给她。1838年四百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元左右。

康涅狄格州把当年的“女青与颜色小姐学校”旧址，改建成了一座纪念馆，而克兰多尔的当年住家，也在1991年被康涅狄格州宣布为历史性地标。克兰多尔于1890年1月28日，病逝于美国堪萨斯州，享年87岁。
(待续)

2011年5月23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